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爱弥儿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二)

爱 弥 儿

[法]卢 梭 著

李士章 译

(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原 序

这本集子中的感想和看法，是没有什么顺序的，而且差不多是不连贯的，它开始是为了使一位善于思考的贤明的母亲看了高兴而写的。最初，我的计划只是写一篇短文，但是我所论述的问题却不由我不一直写下去，所以不知不觉中这篇论文就变成了一本书，当然，就内容来说，这本书的份量是太重了，然而就它论述的事情来说，还是太小了。要不要把这本书刊行发表，我是考虑了很久的；而且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虽然是写过几本小册子，但毕竟难说懂得著书。我原来想把这本书写得好一些，但几次努力也未见成效，不过，经过这一番努力之后，我认为，为了使大家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我应当照现在这个样子把它发表出来；并且，即使说我的见解不好，但假使能抛砖引玉，使其他的人产生良好的看法，我的时间也就没有完全白费。一个深居简出的人，把他的文章公之于世，既没有人替它吹捧，也没有人替它辩护，甚至不知道别人对他的文章想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那么，即使说他的见解错了的话，他也不用担忧别人不加思考就会接受他的错误的。我不想多说良好的教育是多么重要，我也并不试图证明我们常用的教育方法不好，因为这种工作已经有许多人先我而做了，我绝不喜欢拿那些人尽皆知的事情填塞我这本书。我只想说明：很早以来就有人在大声反对这种古老的教育方法了，可是从来没有人准备提出一套更好的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与科学，倾向于破坏的成分多，倾向于建设的成分少。人们



可以用师长的口吻提出非难；至于说到建议，那就需要采用另外一种语气了，然而这种语气，高傲的哲学家是不太喜欢的。尽管有许多的人著书立说，其目的，据说，完全是为了有益人群，然而在所有一切有益人类的事业中，首要的一件，即教育人的事业，却被人忽略了。我阐述的这个问题，在洛克的著作问世以后，一直没有人谈论过，我非常担心，在我这本书发表以后，它仍然是那个样子。

我们对儿童是一点也不理解的：对他们的观念错了，所以越走越入歧途。最明智的人致力于研究成年人应该知道些什么，可是却不思考孩子们按其能力可以学到些什么，他们总是把小孩子当大人看待，而不想一想他还没有成人哩。我所钻研的就是这些问题，其目的在于：即使说我提出的方法是很荒谬的，人们还可以从我的见解中得到收获。至于说应该怎样做，也许我的看法是很不对头，然而我相信，我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出人们应该着手解决的问题了。因而，就从你们的学生开始好好地研究一番吧；因为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你对他们是完全不了解的：如果你抱着这种看法来读这本书，那么，我不相信它对你没有好处。

至于人们称之为作法的那一部分，它在这里不是别的东西，只是自然的行为而已，正是在这里最容易使读者走入歧途；毫无疑问，也就是在这里，人们将来会诋毁我，而且，也许就是人们批评得不错的地方。人们将来会认为，他们所阅读的，不是一篇教育论文，而是一个空想家对教育的幻想。有什么办法呢？我要论述的，不是别人的思想，而是我自己的思想。我和别人的看法毫不相同；很久以来，人们就指责我这一点。难道要我采取别人的看法，受别人的思想影响吗？不行。只能要求我不要坚持己见，不要以为唯有我这个人比其他的人都明智；可以要求于我



的，不是改变我的意见，而是敢于怀疑我的意见：我能够做的就是这些，而我已如是做了。如果有时候我采用了断然的语气，那绝不是为了要强迫读者接受我的见解，而是要向读者阐述我是怎样想的。我为什么要用怀疑的方式提出在我看来一点也不怀疑的事情呢？我要确切地说出我内心是怎样想的。

在毫无顾虑地表述我的意见的时候，我当然了解到绝不能以我的意见作为权威，所以我总连带地说明了我的理由，好让别人去加以判断，并且评判我这个人：尽管我不愿意固执地维护我的见解，然而我并不认为就不应当把它们发表出来；因为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尽管我的意见同别人的意见相左，然而它们绝不是一些无可无不可的原则。它们是我们必须了解其真伪的原则，是给人类为福还是为祸的原则。

“提出可行的办法”，人们一再地对我说。同样，人们也对我说，要实行大家所实行的办法；或者，最低限度要使好的办法同现在的坏办法结合起来。在有些事情上，这样一种想法比我的想法还荒唐得厉害，因为这样一结合，好的就变坏了，而坏的也不能好起来。我宁可完全按照旧有的办法，而不愿意把好办法只采用一半，因为这样，在人的身上矛盾就可能会少一些：他不能一下子达到两个相反的目的。做父母的人啊，可行的办法，就是你们喜欢采用的办法。我应不应该表明你们的这种意愿呢？

对于任何计划，都有两件事情要考虑：第一，计划一定要好；第二，实行起来要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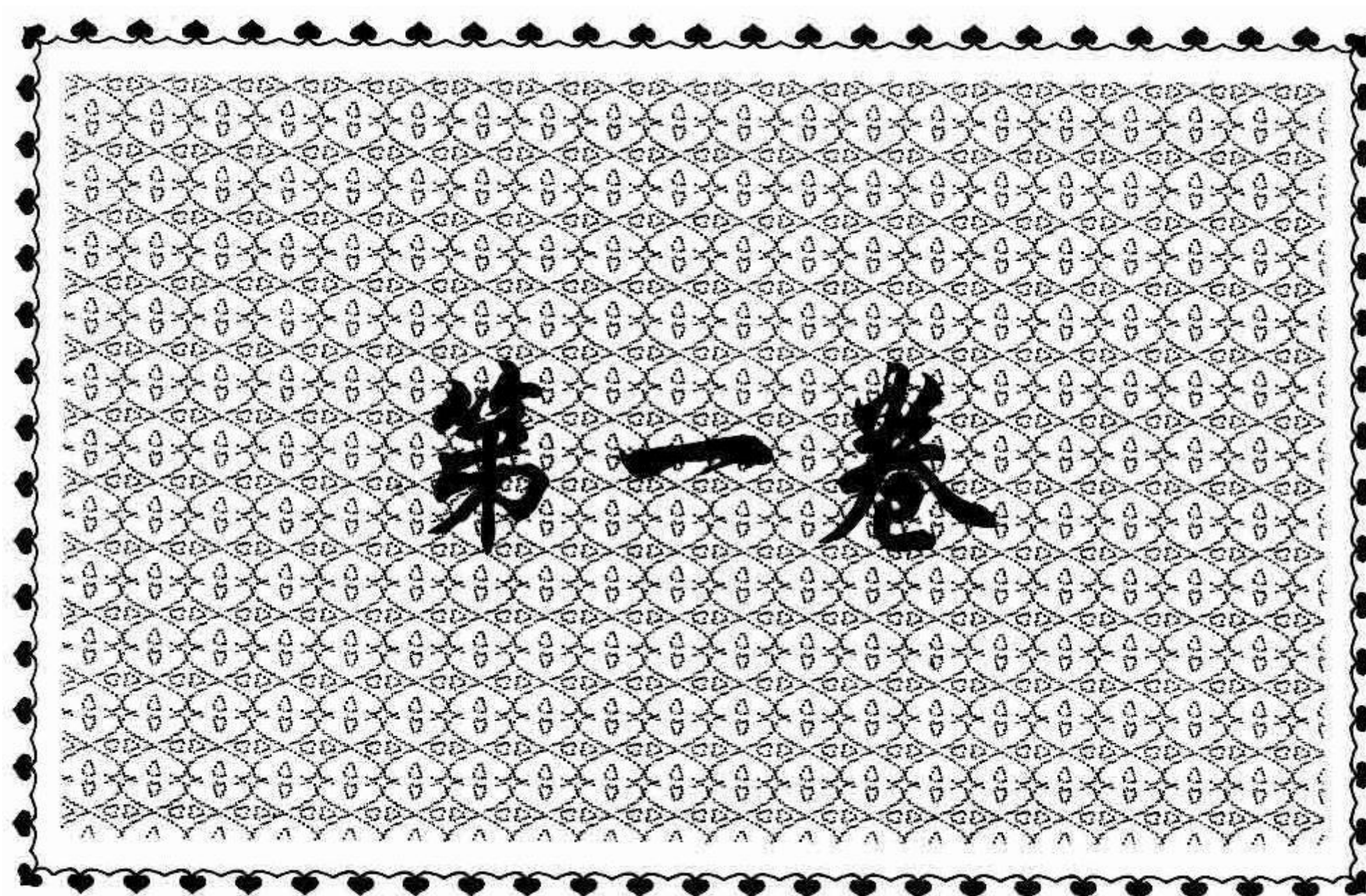
关于第一点，为了要使计划本身能够被人们所接受和实行，只需它具有的好处符合事物的性质就行了；在这里，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所提出的教育方法，只要它适合于人，并且很适应于人的心就行了。



至于第二点，那就要看一些情况中的一些关系如何确定了；这些关系，对事物来说是偶然的，因此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可以千变万化的。某种教育在瑞士可以实施，而在法国却不能实施；这种教育适用于有产阶级，那种教育则适用于贵族。至于实施起来容易还是不容易，那要以许多的情况为转移，这一点，只有看那个方法是单独地用之于这个或那个国家，用之于这种或那种情况，才能肯定它的结果。不过，所有这些个别的应用问题，对我论述的题目来说，并不重要，所以没有列入我的计划的范围。别人如果乐意的话，他们可以去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每一个人可以研究他心里想研究的国家或者想研究的情况。对我来说，只要做到下面一点就算是满足了，那就是，不管人们出生在什么地方，都能采取我提出的方法，而且，只要能把他们培养成我所想象的人，那就算是对他们自己和别人都做了有益的事情。如果我不能实行这个诺言，那无疑是我的错误，但是，如果我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人们再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的话，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因为我所许诺的只是这一点。

目 录

原 序	(1)
第一卷	(1)
第二卷	(65)
第三卷	(205)
第四卷	(279)
第五卷	(513)
附 录	
爱弥儿和苏菲	(730)





好的东西都出自造物之手，然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要强使一种土地滋生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强令一种树木结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他将气候、风雨、季节搞得混乱不清；他伤害他的狗、他的马和他的奴仆；他捣乱一切，毁伤一切东西的原来面目；丑陋和奇形怪状的东西为他所喜爱；他不愿意事物自然的那个样子，甚至于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象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强化训练；必须把人象花园中的树木那样，按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

不这么做，事情可能更糟糕一些；我们人类不愿意受不完善的教养。在后者的情况下，一个人，生来就没有别人教养，他也许简直就不成样子。偏见、权威、需要、先例以及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将扼杀他的天性，而不会为它增添什么东西。他的天性将象一株偶然生长在大路上的树苗，让行人碰来撞去，东弯西扭，不久便弄死了。

我乞求你，慈爱而有先见之明的母亲，由于你善于避开这条大路，而保护这株正在成长的幼苗，让它不受人类的各种舆论的冲击！你要培育这棵幼树，给它浇浇水，使它不至于死亡；它的果实将有一天会令你感到欣喜。趁早给你的孩子的灵魂周围筑起一道围墙，别人可以画出这道围墙的范围，但是你应当给它安上栅栏。我们栽种草木，使它长成一定的样子，我们教育人，使他具备一定的才能。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又高大又健康，他的身材与气力，在他没有学会如何使用它们以前，对他是没有用处的；



它们也许对他还有所不利，因为它们将使别人想不到要帮助这个人；于是，他还没有明白需要些什么之前，就孤孤单单地悲惨地死了。我们同情婴儿的处境，然而我们还不了解，如果人不是从做婴儿开始的话，人类或许是已经灭亡了。

我们生来就是软弱的，所以需要力量；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的，所以需要帮助；我们生来是蒙昧的，所以需要判断的能力。教育会赐与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这样的教育，我们或是受之于自然，或是受之于人，或是受之于事物。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怎样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物获得优良的体验，是事物的教育。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由三种教师培养起来的。一个学生，如果在他身上这三种教师的不同的教育相互冲突的话，他所受的教育就不好，而且将永远不合他本人的心意；一个学生，假如在他身上这三种不同的教育是一致的，都趋向于同样的目的，他就会自己达到他的目标，并且生活得很有意义。这样的学生，才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的。

在这三种不同的教育里，自然的教育完全不能由我们决定的，事物的教育只是在有些方面才能由我们来决定。只有人的教育才是我们能够真正地加以控制的；不过，我们的控制还只是假定的，因为，要知道谁能够对一个孩子周围所有的人的言语和行为统统都管得到呀？

一旦将教育看成是一种艺术，则它差不多就不能取得什么成就，因为，它要成功，便必须把三种教育配合一致，但是这一点是不由任何人决定的。我们殚思极虑所能做到的，只是或多或少



地接近目标而已；不过，要达到这一点，还需要有一些运气咧。

是什么目标呀？它不是别的，它就是自然的目标，这是刚才已经论证过的。既然三种教育必须圆满地配合，那么，我们便要使其他两种教育配合我们完全无法控制的那种教育。或许，自然这个词的意义是太含糊了，在这里，应当尽量把它明确起来。

有人说，自然不过就是习惯罢了。这是什么意思呀？不是有一些强制养成的习惯永远也不能够消灭天性的吗？举例来说，有一些植物被我们阻碍着不让垂直生长，它们便具有这样的习性。自由生长的植物，虽然保持着人们强制它倾斜生长的方向，但是它们的液汁并不因此就改变原来的方向，并且，这种植物如果继续发育的话，它又会直立地生长的。人的习性也是如此。只要人还处在同样的境地，他便能保持由习惯产生的习性，虽然对我们来说这些习性是最不自然的；可是，只要情况一有改变，习惯就消失了天性又回复过来。教育的确只不过是一种习惯而已。有一些人忘掉了他们所受的教育，另外一些人则保持了他们所受到的教育。这种差别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如果是必须把自然这个名词只限用于适合天性的习惯，那么，我们便可以省得说这一番多余的话了。

我们生来就是有感觉的，而且我们一出生就通过各种方式受到我们周围的事物的影响。可以说，当我们一意识到自己的感觉，我们就希望去追求或者逃避产生这些感觉的事物，我们首先要看这些事物令我们感到愉快还是不愉快，其次要看它们对我们是不是方便适宜，最后则看它们是不是符合理性赋予我们的幸福与美满的基本观念。随着我们的感觉愈来愈敏锐，眼界愈来愈开阔，这些倾向就愈来愈明显；可是，由于受到了我们的习惯的遏制，因此它们也就因为我们的见解不同而或多或少地有所变化。



在产生这种变化之前，它们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内在的自然。

所以，必须把一切都归因于这些原始的倾向；假如我们所受的三种教育只不过是有所不同的话，这是可以的；可是，当三种教育彼此冲突的时候，当我们培养一个人，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别人的时候，又怎样办呢？这样，要配合一致，便不可能了。由于不得不同自然或者社会制度进行斗争，所以必须选择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因为我们不能够同时教育成这两种人。

凡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当它的范围很窄，而内部又非常团结的时候，就同大的社会相疏远。凡是爱国者对外国人全是冷酷的：在他们心目中，外国人只不过是人，同他们是没有关系的。这种缺陷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极微小的。重要的是，要对那些同他们一块儿生活的人都很好。在国外，斯巴达人表现是野心勃勃的，是极贪婪的，是不讲仁义的；然而在他们国内，却到处洋溢着公正无私、和睦无间的精神。不要相信那些世界主义者了，因为在他们的著作里，他们宁愿到遥远的地方去探求他们不屑在他们周围履行的义务。这样的哲学家爱鞭打人的原因，为的是免于去爱他们的邻居。

自然人完全是为他自己而生活的；他是数的单位，是绝对的统一个体，只和他自己及他的同胞才有关系。公民只不过是一个分数的单位，是依赖于分母的，它的价值在于他同总体，即和社会的关系。好的社会制度应该是这样的制度：它知道如何才能够最好地令人改变他的天性，如何才能够剥夺他的绝对的存在，而给他以相对的存在，并且将“我”转移到共同体中去，以便使各个人自觉地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人，而只看作共同体的一部分。罗马的一个公民，既不是凯尤斯，也不是鲁修斯，他便是



一个罗马人，他爱他那独有的国家。由于雷居鲁斯变成了他的主人的财产，他就自称为迦太基人。作为外国人，他拒绝接受罗马元老院的席位；一个迦太基人对他下命令，他才能接受。他对别人想挽救他的生命，感到愤慨。他胜利了，于是便昂然回去，受酷刑而死。在我看来，对我们现在所能了解的人来说，这是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的。

斯巴达人佩达勒特，提出要参加三百人会议，他遭到拒绝；但是，鉴于斯巴达有三百名胜过他的人，他也就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我认为，这种表现是真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真诚的：这样的人便是公民。

一个斯巴达妇女，她的五个儿子全在军队里，她等待着战事的消息。一个奴隶来了，她战栗地问他道：“你的五个儿子都战死了。”“贱奴，谁问你这个？”“我们已经胜利了！”于是，这位母亲就跑到庙中去感谢神灵庇护。这样的人就是公民。

凡是想在社会秩序中把自然的感情保持在第一位的人，是不知道他有什么需要的。如果他经常是处在自相矛盾的境地，经常在他的倾向和应尽的本分中间徘徊犹豫，则既不能成为一个人，也不能成为一个公民，他对自己和别人都会一无好处。我们今天的人，今天的法国人、英国人和中产阶级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将变为一无可取的人。

人要有所成就，要成为独立自恃、始终如一，便必须言行一致，就必须坚持他应该采取的主张，毅然决然地坚持这个主张，而且一贯地实行这个主张。我等待着人们将这样的奇迹展现给我，以便知道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公民，或许，他要同时成为这两类人，又是怎样做的。

正是从这两个必然是互相对立的目的之中，产生了两种矛盾



的教育制度：一种是公众的和共同的，另一种则是特殊的和家庭的。

你想要知道公众的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吗？就请你读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本著作，并不如同那些仅凭书名判断的人所想象的是一本讲政治的书籍；它是一篇最好的教育论文，还从来没有写过象这样的教育论文呢。

当人们谈到空想的国家的时候，他们便提出柏拉图的制度；然而，如果莱喀古士只把他那套制度写在纸上而不付诸实施的话，我可能还认为它更空想得多。柏拉图只不过是让人纯洁他的心灵，而莱喀古士却改变了人的天性。

公共的机关已经不再存在了，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因为在没有国家的地方，是不会有公民的。应该从现代的语言中取消“国家”与“公民”这两个词。其理由我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不愿意谈它，因为它同我阐述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

那些人们称之为学院的可笑的机构，然而我是不把它们看成一种公共的教育制度来加以研究的。我也不将世人的教育看作这种制度，因为这种教育想追求两个相反的目的，结果两个目的却全达不到。它只能训练出一些阴险的人来，这些人成天装着事事为别人，却每处为的是他们自己。不过，这种表现既然是大家都有，所以也就骗不了任何人。不过是枉费心机。

我们本身不断感受到的矛盾，便是从这些矛盾中产生的。由于被自然和人引到了相反的道路，因为在这些不同的推动力之间不得不形成分歧，因此，我们就从中采取一个混合的办法，然而我们采取这个办法既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也不能够达到那个目标。我们在整个的一生中便是这样地斗争和犹豫，以致还不能达到我们的意愿，还不能对我们和别人有所贡献，便结束了我们的



生命。

现在要谈一谈家庭教育或自然的教育了。假如一个人惟一无二地只是为了他自己而受教育，那么，他对别人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一个人所抱的两重目的能够结合为一个单独的目的，那么，由于他消除了人的矛盾，便消除了他的幸福生活中的一大障碍。要判断这个人，便必须看他成人以后是怎样的；必须在了解了他的倾向、观察了他的发展、注意了他所走的道路以后，才能作出准确判断；总而言之，必须了解自然的人。我相信，人们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几分收获。

要培养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工作呀？毫无疑问，要做的工作很多；万万不要无所事事，一事无成。当我们只碰到逆风行舟的时候，我们调整航向迂回行驶就可以了；可是，当海面上波涛汹涌，而我们又想停在原地的時候，那就要抛锚。年轻的舵手，当心呀，别让你的缆绳松了，别让你的船锚动摇，不要在你还没有发觉之前，船就漂走了。

在社会秩序中，所有的地位全是有标记的，每个人就应该为取得他相应的地位而受教育。如果一个人是按照他命定的地位而培养的，则教育对其他的地位便不再适宜了。只有在命运同父母的职业一致的时候，教育才是有用的，而在其他情况下，未尝不是由于教育给了学生的偏见，反而对他有害处。在埃及，儿子必须服从他父亲的身分的，所以教育至少还有一个确实可以达到的目标；可是在我们这里，只有阶级始终是那个样子，而人则不断地改变他的地位，在培养他的儿子去取得他的地位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危害他呢。

在自然秩序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他们共同的天职，是取得人品；不论是谁，只要在这方面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就不会



欠缺同他相称的品格。别人要我的学生做军人，做教士，或者做律师，我没有什么意见。在从事他父母的职业之前，大自然就已叫他认识人生了。我教他的技能就是生活。从我的门下出去，我承认，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一个人应该怎么做，他就知道怎样做，他在危急关头，而且不论对谁，都能尽到做人的本分；命运无法令他改变地位，他始终将处在他的地位上。“命运啊，我对你早有防备，我已经把你俘虏，而且将所有一切能够让你来到我身边的道路通通堵塞。”

我们要真正研究的是人的地位。我认为在我们中间最能容纳生活中的幸福和忧患的人就是受了最好教育的人。由此能够得出结论：真正的教育不在于口训而在于实行。我们一开始生活，我们便开始教育我们自己了；教育是同我们的生命一起开始的，我们的第一个教师就是我们的保姆。“教育”这个辞，古人用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养育”，不过，现在这个意思我们已不再用它了。瓦罗说：“助产妇接生，乳母哺育，塾师启蒙，教师教导。”因此，教育、教训和教导，是三种事情，它们的目的是各不相同，象保姆、塾师和教师的一样。然而，这些区别没有被人们搞清楚；为了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儿童是不应当只跟从一个向导的。

因此，我们必须一般地观察问题，必须把我们的学生看做抽象的人，看做无时无刻不受人生的偶然事件影响的人。如果一个人一生来便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土地上，如果一年四季都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每一个人都听天由命，以致永远也不能有所改变，那么现行在某些方面的办法还是很好的；一个儿童接受了为取得其地位的教育，由于永远不能脱离这种地位，所以也就不至遇到他种地位的种种麻烦。可是，鉴于人生的变化无常，鉴于这个世纪令